

信任有助于提升创业绩效吗？*

——基于 876 个农民创业者的理论探讨与实证检验

赵佳佳¹ 魏娟¹ 刘军弟^{1,2} 刘天军^{1,2}

摘要：厘清农民创业绩效提升的内在逻辑，对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激发农村创新活力、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全国东、中、西部四省 876 个农民创业者的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信任对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信任对农民创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创业学习在信任与农民创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信任可通过促进创业学习间接影响农民创业绩效；创业环境正向调节信任对创业学习的积极影响，但在创业学习与创业绩效之间的调节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进一步的有调节中介检验结果显示：创业环境对创业学习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在良好的创业环境中，创业学习在信任与农民创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得到增强。因此，从推动创业高质量发展来看，政府应推进乡村诚信体系建设，增强农民创业者信任水平；重视创业教育与技能培训，提高创业学习能力；完善创业激励政策，优化营商环境。

关键词：信任 农民创业 创业绩效 创业学习 创业环境

中图分类号：F324.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国家陆续出台多项激励政策，激活农村地区创新创业活力，农村创业环境得到大幅改善，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农民创业激情空前高涨。然而，农民创业者又面临创业成功率低、新创企业发展质量效益不高等现实问题（张玉利、冯潇，2019）。在此背景下，识别影响农民创业绩效的决定因素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创业作为一种复杂的商业活动，为获取超额利润提供机会的同时也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Bennett and Lemoine, 2014）。Arrow（1972）指出市场交易中的不确定性蕴含经济成本，减少不确定性即可降低风险、提高收益。因此，创业者的核心任务之一在于利用企业家精神和创业能力减少不确定性对创业活动的影响（Brouwer, 2000）。信任作为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西部地区农业市场培育与开放”（项目编号：71933005）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信任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创业决策与创业绩效”（项目编号：7177308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审稿专家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本文通讯作者：刘天军。

简化社会复杂性和降低不确定性的核心机制（郭慧云等，2012），在增加创业者心理安全感（申丹琳，2019），增强信息交换和创业经验分享（Geneste and Galvin, 2013），促进创业协同合作（Bhagavatula et al., 2010）等方面发挥作用。因此，创业者的信任可能对创业绩效具有积极作用。

探究农民这一创业群体的信任具有中国情境的特殊意义。传统观念认为以亲缘、血缘、地缘关系聚集在一起的农村居民往往比城市居民具有更高信任水平，但随着中国经济加速转型，农村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也发生显著变化，不可避免对农民原有信任结构产生冲击，信任呈现出明显衰落趋势。杨明等（2011）基于全国性调查数据发现 2002 及 2003 年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拥有更高信任水平，随后差距不断缩小，至 2007 年两者差距完全消失。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 2012~2018 年间农村居民的信任水平已显著低于城镇居民^①。“信任危机”是否会对农村地区商业活动产生影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问题。然而，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已有研究大多探讨信任对普通居民创业的影响（周广肃等，2015；Dou et al., 2019），对于农民创业者这一特殊主体关注较少。并且，已有文献均止步于个体创业决策，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关注明显不足。事实上，促进创业绩效、提高创业成功率才是政策制定者与创业实践者关心的最终目标。故本文将在农民创业情境下对信任和创业绩效的内在关系展开深入研究。

理论上，信任可以促进创业网络中的知识分享，推动创业学习（Bergh et al., 2011）。创业学习对农民创业者而言尤其重要，主要依据是相较于其他创业群体，农民创业者普遍人力资本较低，创业技能匮乏，只有通过不断的创业学习才能突破知识困境，提高创业绩效（张敬伟、裴雪婷，2018）。因此，创业学习可能是影响信任与农民创业绩效的重要中介变量。此外，农民创业绩效的提升不仅取决于创业者内在因素，还受所处创业环境的影响（王洁琼、孙泽厚，2018）。创业环境作为创业成功或失败的各种条件及要素总和，不仅影响农民创业者的信任，也对创业学习和创业绩效产生影响（郭铖、何安华，2017）。自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为改善创业环境、活跃创业氛围做出多种尝试，但目前农民在创业过程中仍面临诸多障碍，如融资贷款困难，注册审批手续复杂等问题（郑风田，2018）。政府主导的创业环境优化在农民创业绩效提升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待深入分析。为此，本研究将创业环境纳入分析框架，探讨信任、创业学习与农民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本文采用浙江、安徽、河南和陕西四省 876 个农民创业者的调研数据，运用层次回归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信任与农民创业绩效之间的内在机理。与已有研究相比，可能的贡献包括以下三点，第一，从创业者信任视角出发分析农民创业绩效的提升路径，丰富创业绩效前因研究。第二，将内生的创业学习与外生的创业环境纳入分析框架，构建有调节中介的整合理论模型，实证探讨了创业学习的中介作用与创业环境的调节效应，深化不同路径和情境下对信任与农民创业绩效关系的理解。第三，以中国 876 个农民创业者为研究样本，用经验数据揭示中国农民创业者的信任对创业绩效的积极作用，为提升农民创业质量，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提供科学支撑。

^① 本文作者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8 年问卷中“一般来说，您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和人相处要越小心越好？”计算所得。

二、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一）概念界定

1.信任。信任在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中具有不同内涵与外延，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将信任视为个体行为意向，即对他人的行为有积极预期并自愿承受可能的负面影响（Newton and Zmerli, 2011）。另一种观点认为信任是基于已有信息在个体偏好基础上的理性选择，但理性选择仅限于短期可计算成本收益的场景（Poppo et al., 2016）。鉴于创业是从机会发现与识别、资源整合再到创办企业并获得绩效的长周期过程，创业者的信任更符合行为意向观的逻辑要求。行为意向观将信任定义为：信任者对被信任对象持有的积极评价，相信被信任对象的行为有利于信任者；并且信任者在这种心理态度的指导下做出对应行为。被信任对象可以是人、具体的物，也可以是无形的对象。进一步，本文借鉴 Welter（2012）在创业领域对信任的“三分建构”分类思路，针对创业过程中可能面对的行为对象，将信任划分为情感信任、制度信任以及社会信任，此三者之间协调共处相互促进。具体而言，情感信任对象为身边的人，这是一种源自多种情感依恋的信任（Granovetter, 2017）。当个体将情感投注所信任对象时，情感信任得以萌生和发展。情感信任通常存在于个体最为亲密的关系圈（如家庭关系圈，亲戚朋友圈等）。基于情感信任建立的关系网不仅为农民创业者提供创业初期亟需的物质资源，也为创业者提供持续的情感支持。制度信任是对除自然人以外其他社会主体的信任，如组织、制度与规则等（张立芸、谭康荣，2005），在一些研究中也称为政治信任或政府信任。制度信任本质是一种基于威慑的信任，这种信任主要源于制度安排，迫使欺骗和背叛无法实现（Granovetter, 2017）。制度信任的“制度”可涵盖规章制度本身及制定和实施制度的组织或个人，如政策法规、各级政府部门及其行政人员等。社会信任的对象则更为宽泛，体现的是社会共同期望，即个体在社会交往中表现出明智、必要时互惠的行为，也可理解为因群体中社会价值认同而产生的社会义务感，这种义务感形塑个体行为，使社会中的行动者在与他人合作时无需依赖对其行为的理性判断（Welch et al., 2005）。社会信任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促进经济发展（Putnam et al., 1994）。

2.农民创业与绩效。本文借鉴 Shane and Venkataraman（2000）的观点，将农民创业定义为：农村地区居民依托当地自然社会经济环境，通过创业机会识别与开发、要素资源整合与利用，最终实现新组织的创立、开发新产品或新服务，为所在地域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并最终实现自我价值的完整过程。本文借鉴组织管理领域对绩效的研究成果（余绍忠，2013），认为创业绩效不仅仅是简单财务概念，而是一个多维综合评价系统。结合农民创业的内涵，农民创业绩效指的是表征农民创业过程最终结果的评价体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信任与农民创业绩效。信任作为简化社会复杂性和降低不确定性的重要机制，可在三个维度对农民创业绩效产生影响。首先，情感信任可以为农民创业者提供心理资本，促进创业绩效（董静、赵策，2019）。基于情感的心理资本为农民创业者提供强大内生动力，使其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创业活动的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同时，受信任双向传导机制的影响，较高的情感信任会使创业者家人和亲

戚处于被信任、被依赖的“心理图式”中，这种良性互动有利于农民创业者获得更多支持。其次，制度信任有助于农民创业者识别与利用政府推动型创业机会（Dai et al., 2020），帮助农民创业者把握市场方向，及时调整经营模式与策略，提高创业绩效。中国政府经常以制定产业政策的方式支持农业农村发展，但是这些项目的实施与政策的执行往往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不确定性。相较于普通创业者，制度信任水平高的农民创业者更愿意相信政府政策，因此具有更大的概率识别出此类创业机会，提前进入目标领域形成“先发优势”。最后，高水平的社会信任会显著减少创业者在商业活动中的交易成本（曾燕萍，2019），有利于创业绩效的提升。随着业务的发展与扩大，农民创业者需要拓展创业活动的空间范围，与市场中的其他群体展开合作，此时，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农民创业者更容易接受口头协议等非正式合同，为初创企业节约大量交易成本。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H1：农民创业者的信任水平越高，其创业绩效越好。

2. 创业学习的中介效应。知识基础观（Knowledge-Based Theory）认为知识对企业的创建和成长至关重要。除正规教育外，创业知识绝大部分源于创业实践中的不断学习。所谓创业学习是指基于先前创业经验及外部信息搜集，通过意义建构形成独特创业知识，最终用于解决创业难题的过程（Politis, 2005）。相较于其他创业者，农民创业者普遍面临受教育程度偏低，创业经验匮乏，认知水平不高等困境，创业学习成为农民创业者获取知识和经验，提升创业技能，促进创业绩效的重要渠道（张敬伟、裴雪婷，2018）。具体来说，一方面，创业学习可通过增加农民创业知识和信息促进创业绩效。作为创业学习的结果，创业知识和信息可以提高农民创业者的创业激情、推动创业机会开发、促进农村资源利用从而提高创业绩效（单标安等，2015）。另一方面，创业学习可通过提高农民创业者认知与思维能力提高创业绩效（Tseng, 2013）。首先，创业学习可提高创业者自我效能感。农民创业者的自我效能感可促进其评估自身及其关系网络中的知识差距，训练解决问题的整体方案与技能，增加创业成功率。其次，创业学习有助于农民创业者进行自我评估和反思。通过对已发生事件进行反思学习，农民创业者可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及未来适用场景，从而促进创业绩效的提升。最后，创业学习帮助农民创业者形成批判性思维，提高信息评估能力，进而使他们在复杂创业实践中更迅速和准确地识别问题本质。

从信任视角来看，信任是创业者向外部环境（如顾客，供应商，同行等）学习的前提条件，是创业学习的重要前定变量（Bergh et al., 2011）。首先，信任通过调控信息与经验的沟通意愿影响创业学习。创业学习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强调与网络中其他成员的知识共享与经验交流。比如，信任水平较低的农民创业者在学习网络中容易表现出紧张、敌对等消极情绪，这种消极情绪会削弱创业者的行动自由度，诱致知识隐藏行为，最终阻碍个体创业学习（赵红丹、夏青，2019）。其次，信任通过改变信息与经验的采纳程度影响创业学习。创业学习同时也是创业者通过探索与开发的形式将经验和信息转化编译成创业知识为己所用的过程（Politis, 2005），这一过程的起点是基于对已获取信息和经验的信任，转换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业者的信任水平。举例来说，当收到外界机会信息时，低信任水平的农民创业者常常无法客观衡量所获信息的真实价值，进而削弱对信息的加工利用程度。因此，农民创业者信任水平可通过影响信息与经验的吸收，最终影响创业学习（Bergh et al., 2011）。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假说：

H2: 创业学习在信任与农民创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H2a: 农民创业者信任对创业学习具有正向影响。

H2b: 创业学习对农民创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3. 创业环境的调节效应。创业作为一种情境嵌入型商业活动，与所处创业环境密不可分。Gartner (1985) 的经典创业要素模型中环境被认为是核心四要素之一。创业环境指创业过程中影响企业创建和成长的一系列外部条件集合(蔡莉等, 2007), 通常也被认为是政府和社会为创业者创办新企业所搭建的公共平台。在全球创业观察(GEM)框架中创业环境包含政府支持、金融支持、文化与规范、创业教育等 12 方面内容。聚焦农村情境, 刘畅等(2015)将其分为有形环境(政策支持、金融支持、基础设施)和无形环境(市场环境、服务环境、文化环境)两大类。新创企业从环境中识别和发现创业机会, 整合财物和人力资源, 最终实现创业企业发展。理论上, 创业环境作为情境变量不直接作用于创业绩效, 其发挥作用的内在逻辑是通过搭建资源平台或提供生存土壤使创业所需关键要素得以聚集, 即“平台集聚资源, 资源服务平台”。因此, 创业环境应被当作促进企业成长的调节变量而非预测变量。实证上, 郭铖、何安华(2017)分析得出创业环境可以调节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的关系。Rooks et al. (2016)提出在不同的创业环境下, 创业者从社会网络中获取的资源存在显著差异。因此, 本文认为创业环境在“信任—学习—绩效”框架中起调节作用。

首先, 创业环境调节信任与创业学习。一方面, 良好的创业环境中, 信任对创业学习的正影响将被加强。主要依据是良好的创业环境使农民创业者对所创事业前景具有正面预期, 提高创业者心理资本(王洁琼、孙泽厚, 2018), 激发创业激情和主观能动性, 增强学习动机, 在此情境下农民创业者的创业学习效果将被增强。另一方面, 良好的创业环境影响农民创业者的风险偏好(王勇, 2017)。本质上说, 信任是一种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风险偏好倾向。因此, 良好的创业环境可以增强创业者信任水平, 从而使得创业者对待学习更加积极主动。反之, 恶劣的创业环境使创业者面临众多资源约束, 导致心理上的紧张与不安全感, 这些负面情绪削弱了信任对创业学习的正向影响。

其次, 创业环境调节创业学习与绩效。创业环境不同导致农民创业者学习效果存在差异, 最终形成新创企业绩效的异质性。具体来说, 当创业环境较好时, 创业学习对绩效的正影响被加强, 主要依据是较好的创业环境有利于创业过程的各个环节, 有助于农民创业者利用创业学习所获能力对资源进行科学配置、利用创业学习所获信息对市场进行准确研判, 最终促进创业绩效的提高。反之亦然。由此可得假说:

H3: 创业环境正向调节创业学习在信任与农民创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H3a: 创业环境正向调节信任与创业学习之间的关系。

H3b: 创业环境正向调节创业学习与农民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综上, 本文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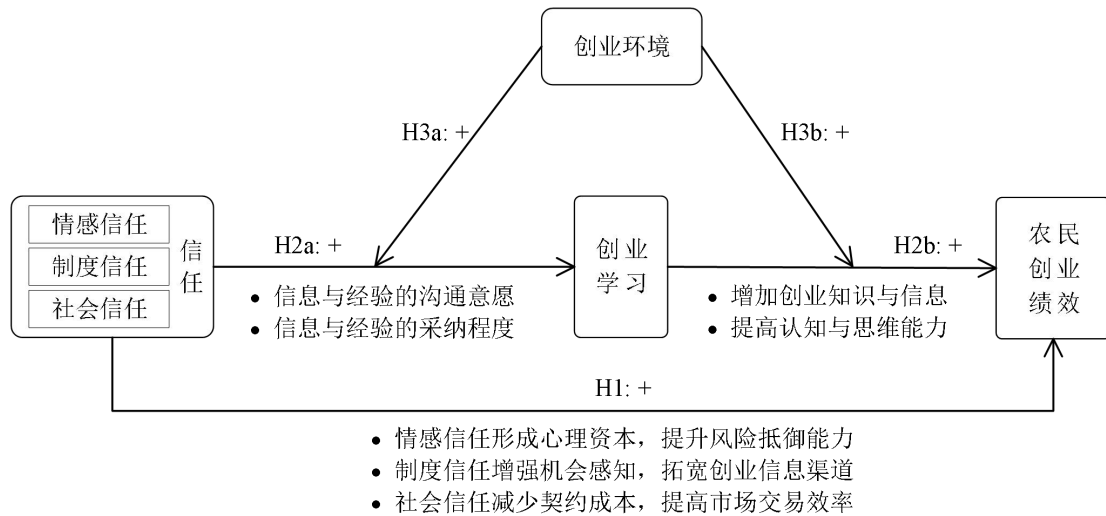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图

三、数据来源、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一) 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情况

本文研究对象为农村地区创业者, 根据定义样本须满足三个条件: ①农村地区常住居民(每年居住半年以上); ②处于创业时期(创办企业不超过10年); ③受访者须为企业法人或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本人。具体抽样过程如下: 首先, 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位置差异, 课题组在东中西部选取浙江、安徽、河南和陕西四省形成一级抽样框。其次, 根据省内经济发展水平及创新创业分布情况, 同时考虑调研便利性与可行性原则, 抽取浙江省温州市、丽水市、宁波市, 安徽省宣城市、铜陵市, 陕西省宝鸡市、咸阳市, 河南省濮阳市、平顶山市、汝州市作为二级抽样单元。最后, 从当地工商部门申请到已登记注册并符合此次调研的汇总名单, 形成末端抽样单元, 在此基础上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每市确定100~150的目标户数。课题组分别于2017年和2019年开展了两次农民创新创业问卷调查, 共收回问卷917份, 其中第一次收回610份, 第二次收回307份, 剔除无效问卷后, 共获得适合本研究的有效问卷876份, 问卷有效率95.53%。在受访样本中, 创业者以男性居多, 占比90.53%; 创业者年龄以41~50岁年龄段居多, 占比达43.61%; 创业者受教育水平以高中或中专学历居多, 占比为68.69%; 从创业所处行业来看, 种植业占比最高为45.55%, 其次是服务业23.52%, 然后为养殖业17.58%, 加工业占比最少仅为13.36%。

(二) 变量测量与描述性统计

1. 自变量: 信任。如前文所述, 信任包括情感信任, 制度信任与社会信任三个维度。情感信任借鉴李新春等(2015)和世界价值观调查的量表, 共5个题项, 包括与亲戚、同一大姓成员、朋友等的相互信任程度, 各题项均采用Likert五点测量(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为0.831)。制度信任参考罗家德等(2017)的量表, 共4个题项, 包括对中央及当地政府、政府规程等的信任程度, 采用Likert五点测量(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为0.847)。社会信任借鉴高学德、翟学伟(2013)等对社会信任的测度, 共3

个题项,使用 Likert 五点测量(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为 0.743),详细题项内容如表 1 所示。

2.因变量:创业绩效。借鉴刘畅等(2015)开发的创业绩效量表,从生存绩效、个人绩效和成长绩效三个维度综合刻画农民创业绩效,共 9 个题项,其中生存绩效包括运营情况、销售情况和盈利情况;个人绩效包括总体满意度、目标实现和目标满意情况;成长绩效包括与同行相比收入、盈利和市场份额情况,使用 Likert 五点测量(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为 0.861),详细题项内容见表 1。

3.中介变量:创业学习。借鉴单标安等(2014)开发的创业学习量表,从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三个维度来测量,具体包括积累与利用经验、与专业技术人员交流学习、通过创业实践反思现有行为、持续搜集内外部信息等 9 个题项,均采用 Likert 五点测量(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为 0.798),详细题项内容见表 1。

4.调节变量:创业环境。借鉴王洁琼、孙泽厚(2018)开发的创业环境量表,从政府支持、市场环境和金融支持三个方面来测度创业环境,共 10 个测量问题,政府支持包含信息咨询、技术指导和创业培训;市场环境包含产品和技术更新率、市场竞争情况和顾客偏好情况;金融支持包含贷款优惠、贷款手续和贷款难易度,采用 Likert 五点测量(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为 0.784),详细题项内容见表 1。

5.控制变量。为减少遗漏变量偏误,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个人特质方面,选取创业者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等变量;行业特征方面,以种植业为参照组,引入养殖业、加工业、服务业 3 个行业虚拟变量;区域特征方面,以河南省为参照组,引入安徽省、浙江省、陕西省 3 个地区虚拟变量;此外,本文还控制了一些可能同时影响信任与创业绩效的混淆变量,如创业失败经历、主观幸福感、风险偏好和健康自评等。

表 1 变量题项、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分维度	题项或变量说明	赋值或单位	均值	标准差
信任	情感信任	我与大多数亲戚的相互信任程度	非常不信任=1,不信任=2,一般=3,信任=4,非常信任=5	4.236	0.584
		我与同一大姓成员的相互信任程度		3.935	0.621
		我与大多数朋友的相互信任程度		4.113	0.561
		我与大多数邻居的相互信任程度		3.903	0.605
		我与大多数同村村民的相互信任程度		3.739	0.657
	制度信任	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	非常不信任=1,不信任=2,一般=3,信任=4,非常信任=5	4.515	0.677
		我对当地政府的信任程度		4.058	0.781
		我对国家政策的信任程度		4.460	0.681
		对当地政府政策和规程的信任程度		4.008	0.834
	社会信任	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是可信任的	非常不同意=1,比较不同意=2,不确定=3,比较同意=4,非常同意=5	3.668	0.982
		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会相信他人		3.983	0.813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是可以做到的		4.022	0.759
创业绩效	生存绩效	我所创事业整体运营情况良好	非常不同意=1,比较不同意=2,不确定=3,比较同意=4,非常同意=5	4.049	0.705
		我所创事业销售情况良好		3.970	0.775
		我所创事业盈利情况良好		3.676	0.889

信任有助于提升创业绩效吗

	个人绩效	我对所创事业的总体满意度较高	非常不同意=1, 比较不同意	3.305	1.189	
		我实现了创业开始前设定的目标	=2, 不确定=3, 比较同意	3.976	0.839	
		我对实现奋斗目标而获得的成就感到满意	=4, 非常同意=5	3.465	1.210	
	成长绩效	目前的生意销售收入增长比同行更快	非常不同意=1, 比较不同意	3.291	1.032	
		目前的生意盈利水平增长比同行更快	=2, 不确定=3, 比较同意	3.179	1.020	
		目前的生意市场份额增长比同行更快	=4, 非常同意=5	3.303	0.985	
创业学习	经验学习	积累和利用经验对我创业帮助很大	非常不同意=1, 比较不同意	3.919	0.940	
		不断反思先前的失败行为	=2, 不确定=3, 比较同意	3.812	1.010	
		失败并不可怕, 关键在于能从中吸取经验	=4, 非常同意=5	3.475	1.112	
	认知学习	经常与行业中的专业人员进行交流	非常不同意=1, 比较不同意	4.412	0.713	
		非常关注同行业中“标杆”企业的行为	=2, 不确定=3, 比较同意	4.360	0.714	
		经常参与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讨论会	=4, 非常同意=5	3.818	1.106	
实践学习	创业过程中持续搜集内外部环境的信息	非常不同意=1, 比较不同意	4.184	0.650		
	通过持续创业实践来反思及纠正已有认知	=2, 不确定=3, 比较同意	4.297	0.611		
	通过创业实践获得经验极为有限(反向题)	=4, 非常同意=5	4.505	0.571		
创业环境	政府支持	当地政府鼓励和支持农民自主创业	非常不同意=1, 比较不同意	4.233	0.902	
		当地政府为农民创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2, 不确定=3, 比较同意	4.026	1.050	
		当地政府为农民创业者提供技术指导	=4, 非常同意=5	3.961	1.167	
		当地政府为农民创业者提供创业培训		4.074	1.122	
	市场环境	本行业中产品和技术更新很快	非常不同意=1, 比较不同意	3.916	1.060	
		竞争对手的行为多变、很难预测(反向题)	=2, 不确定=3, 比较同意	3.711	1.085	
金融支持	顾客总是偏好新产品和新服务	=4, 非常同意=5	3.823	1.033		
	创业贷款有优惠	非常不同意=1, 比较不同意	3.507	1.230		
	创业贷款申请手续非常简单	=2, 不确定=3, 比较同意	3.096	1.286		
控制变量	创业失败经历	创业贷款附加条件太多(反向题)	=4, 非常同意=5	3.272	1.160	
		性别	受访者性别	男=1, 女=0	0.905	0.293
		年龄	受访者年龄	单位: 岁	45.360	8.643
	自评健康	受教育水平	受教育年限	单位: 年	10.420	3.090
		自评健康	受访者当前健康状况	不健康=1, 一般=2, 比较健康=3, 很健康=4, 非常健康=5	4.048	1.040
	管理销售	管理经验	是否曾经担任过管理职务	是=1, 否=0	0.618	0.486
		销售经验	是否曾经担任过销售职务	是=1, 否=0	0.525	0.500
创业失败经历		是否经历过创业失败	是=1, 否=0	0.274	0.446	
风险偏好	通过情景假设的“抛硬币”游戏衡量	“无论抛出正反面, 您都获得 250 元”=1, “抛出正面您得 200, 反面得 400 元”=2, “抛出正面得 150, 反面得 550 元”=3, “抛出正	2.725	1.633		

			面您得 100 元, 反面得 700 元”=4; “抛出正面您得 0 元, 反面得 1000 元”=5 0-10 之间, 非常不幸福=0, 非常幸福=10	8.619	1.565
	主观幸福感	受访者的主观生活幸福程度			

注: 反向题在数据分析时已做反转处理。

(三) 共同方法偏差与信效度检验

1.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采用量表问卷法时, 因特定测量方法(测量环境, 题项语境以及项目自身特征等) 难免造成潜在的系统测量偏差, 一般称之为共同方法偏差。这种系统误差可能导致错误的因果关系推论, 严重影响结果的准确性。为避免这种系统误差的影响, 本研究采取以下措施进行事前控制并辅以事后检验以解决潜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首先, 在问卷量表中穿插了一些客观性以及开放性问题; 其次, 问卷设计了一些反向编码题, 以此避免受访者陷入持续的量表填写模式; 最后,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对数据进行检验, 参考以往做法, 在不做任何旋转且特征根大于 1 的提取方式下, 对 4 个潜变量的所有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结果发现, 第一主成分解释的变异量为 16.91%, 不到总提取方差累积占比(63.32%) 的一半, 说明本研究所用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 信度检验。本研究拟从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alpha) 和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两个方面评估测量的可信度。结果表明, 所有潜变量的 Cronbach's alpha 均大于理想值 0.7, 其中信任量表为 0.846, 创业绩效量表为 0.861, 创业学习量表为 0.798, 创业环境量表为 0.784。而组成信度 CR 方面, 所有潜变量均超过建议值 0.7。因此, 本研究中测量量表信度较高。

3. 效度检验。本研究从两个方面来评估测量效度: 首先, Hair, et al. (2014) 建议每个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应大于 0.5, 0.7 以上则更为理想。本研究中各潜变量的因子载荷全部大于阈值 0.5, 大部分达到理想值 0.7。其次, 本研究用平均方差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 来衡量聚合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Fornell and Larcker (1981) 认为平均方差抽取量 AVE 的理想值为 0.5 以上, 所有潜变量的 AVE 均在可接受范围内, 基于以上判断, 本研究的测量量表具有良好聚合效度。

(四) 模型设定

本文参照 Hayes (2018) 提出的有调节中介的分析流程依次检验信任对农民创业绩效的直接效应, 创业学习的中介效应、创业环境的调节效应以及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具体检验分为四步:

$$Y = c_0 + c_1X + c_2W + c_3XW + \mu_1 \quad (1)$$

$$M = a_0 + a_1X + a_2W + a_3XW + \mu_2 \quad (2)$$

$$Y = c'_0 + c'_1X + c'_2W + c'_3XW + b_1M + b_2WM + \mu_3 \quad (3)$$

(1) 式、(2) 式和 (3) 式中, Y 表示农民创业绩效; X 表示信任; W 表示创业环境; M 表

示创业学习； μ_1 、 μ_2 、 μ_3 为误差项。第一步检验直接效应，即判断（1）式中 c_1 的系数是否显著， c_1 为不考虑中介的直接效应（信任对农民创业绩效的直接影响）。第二步检验中介效应，（2）式中的系数 a_1 为中介效应的前半段（信任对创业学习的影响），（3）式中的系数 b_1 为中介效应的后半段（创业学习对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中介效应不仅需要判断前后两段的系数是否单独显著，还需验证系数乘积 a_1b_1 的显著性。第三步检验调节效应，其中 c_3 为直接作用路径上的调节效应系数（即创业环境对信任与农民创业绩效直接影响的调节作用）， a_3 为中介路径前半段上的调节效应系数（即创业环境在信任与创业学习之间的调节作用）， b_2 为中介路径后半段上的调节效应系数（即创业环境在创业学习与农民创业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第四步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即创业学习的中介效应是否被创业环境调节。将（2）式代入（3）式，整理可得有调节的中介效应部分为 $a_1b_1 + a_1b_2W + a_3b_1W + a_3b_2W^2$ ，可拆解成两部分：中介效应 a_1b_1 以及调节变量 W 相关的项 a_1b_2 、 a_3b_1 、 a_3b_2 ，三组中任一组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可证实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存在。

四、假说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假说检验

本文采用层次回归估计方法，所有回归均使用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同时对全部回归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诊断，方差膨胀因子（VIF）均低于 3.0，表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共线程度在合理范围内，不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

1.信任对农民创业绩效的直接效应（假说 H1）。表 2 方程 1 和方程 2 为信任对农民创业绩效的直接效应检验结果。方程 1 只加入控制变量，方程 2 在方程 1 基础上加入自变量信任，方程 2 显示，信任对农民创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beta=0.361$ ， $p<0.01$ ），表明信任水平高的农民创业者具有更好的创业绩效。此外，加入自变量信任后，方程 2 比方程 1 的 R^2 增加了 0.046，说明信任对农民创业绩效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假说 H1 得到支持。

表 2 层次回归检验结果

	因变量：农民创业绩效					因变量：创业学习		
	方程 1	方程 2	方程 3	方程 4	方程 5	方程 6	方程 7	方程 8
自变量								
信任	—	0.361*** (0.059)	0.359*** (0.059)	0.276*** (0.063)	0.276*** (0.063)	0.291*** (0.042)	0.288*** (0.043)	0.305*** (0.043)
调节变量与交互项								
创业环境	—	—	0.051 (0.042)	0.046 (0.041)	0.046 (0.041)	—	0.010 (0.029)	0.013 (0.029)
信任×创业环境	—	—	0.110 (0.097)	—	—	—	—	0.169** (0.066)
中介变量与交互项								
创业学习	—	—	—	0.251***	0.250***	—	—	—

信任有助于提升创业绩效吗

				(0.051)	(0.051)			
创业学习×创业环境	—	—	—	—	-0.011 (0.096)	—	—	—
控制变量								
性别	0.150* (0.082)	0.105 (0.079)	0.107 (0.079)	0.101 (0.080)	0.101 (0.080)	0.023 (0.051)	0.023 (0.052)	0.023 (0.051)
年龄	0.009*** (0.003)	0.008*** (0.003)	0.008*** (0.003)	0.008*** (0.003)	0.008*** (0.003)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受教育水平	0.001 (0.008)	0.000 (0.007)	-0.000 (0.007)	-0.001 (0.007)	-0.001 (0.007)	0.004 (0.005)	0.004 (0.005)	0.004 (0.005)
自评健康	0.078*** (0.025)	0.069*** (0.025)	0.071*** (0.024)	0.051** (0.024)	0.051** (0.023)	0.074*** (0.015)	0.074*** (0.015)	0.077*** (0.015)
管理经验	0.125** (0.051)	0.126** (0.050)	0.124** (0.049)	0.099** (0.049)	0.099** (0.049)	0.108*** (0.034)	0.108*** (0.034)	0.106*** (0.034)
销售经验	0.028 (0.049)	0.020 (0.048)	0.021 (0.048)	0.011 (0.047)	0.012 (0.047)	0.040 (0.033)	0.040 (0.033)	0.039 (0.032)
创业失败经历	-0.075 (0.048)	-0.077 (0.047)	-0.079* (0.047)	-0.080* (0.046)	-0.080* (0.047)	0.010 (0.034)	0.009 (0.034)	0.008 (0.033)
风险偏好	0.029** (0.013)	0.027** (0.013)	0.028** (0.013)	0.021* (0.013)	0.021* (0.013)	0.024** (0.009)	0.024** (0.009)	0.025*** (0.009)
主观幸福感	0.100*** (0.018)	0.078*** (0.017)	0.077*** (0.017)	0.076*** (0.017)	0.076*** (0.017)	0.005 (0.012)	0.005 (0.012)	0.004 (0.012)
是否养殖业	0.121** (0.060)	0.119** (0.059)	0.115* (0.059)	0.096* (0.057)	0.096* (0.057)	0.086** (0.041)	0.085** (0.041)	0.081** (0.041)
是否加工业	-0.086 (0.072)	-0.079 (0.069)	-0.079 (0.070)	-0.060 (0.069)	-0.059 (0.069)	-0.045 (0.049)	-0.044 (0.049)	-0.055 (0.049)
是否服务业	0.008 (0.062)	0.021 (0.062)	0.022 (0.062)	0.043 (0.061)	0.043 (0.061)	-0.083** (0.041)	-0.082** (0.041)	-0.083** (0.040)
常数项	1.648*** (0.276)	0.510 (0.333)	0.340 (0.339)	-0.178 (0.353)	-0.177 (0.350)	2.359*** (0.234)	2.339*** (0.243)	2.234*** (0.237)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 ²	0.131	0.177	0.180	0.205	0.205	0.192	0.192	0.200
调整的 R ²	0.115	0.161	0.162	0.187	0.186	0.176	0.175	0.182
F 值	6.502***	9.094***	9.255***	10.482***	10.197***	11.983***	11.310***	11.592***
样本量	876	876	876	876	876	876	876	876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2. 创业学习的中介效应（假说 H2）。创业学习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见表 2 方程 4 和方程 6 所示。

方程 4 为中介效应的后半段检验, 从表中系数可知, 创业学习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创业学习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说 H2b 成立。方程 6 为中介效应的前半段检验, 结果显示, 信任与创业学习具有显著正向关系 ($\beta=0.291, p<0.01$), 表明信任水平高的农民创业者可获得更好的创业学习, 假说 H2a 得到证实。为解决依次检验的检验力较低问题, 本文利用中介效应逐步检验方法(Causal Steps Approach), 并采用具有更精确的置信区间与更高检验力的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具体计算结果见表 3, 创业学习间接效应在 95%水平下置信区间为[0.044, 0.111], 不包含 0, 验证创业学习的部分中介效应存在, 且将信任根据维度拆分后的区间估计结果显示创业学习的中介效应依然通过显著性检验, 因此假说 H2 得到验证。

表 3 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 Bootstrap 检验结果 (样本量=876)

作用路径		点估计	参数显著性估计		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区间估计		双尾检验 P 值
			标准误	Z 值	置信下限	置信上限	
直接效应	信任→创业绩效	0.249	0.042	5.973	0.147	0.351	***
	情感信任→创业绩效	0.137	0.055	2.480	0.029	0.246	**
	制度信任→创业绩效	0.179	0.043	4.200	0.096	0.263	***
	社会信任→创业绩效	0.126	0.038	3.340	0.052	0.200	***
间接效应	信任→创业学习→创业绩效	0.077	0.015	5.295	0.044	0.111	***
	情感信任→创业学习→绩效	0.059	0.015	4.050	0.030	0.087	**
	制度信任→创业学习→绩效	0.039	0.012	3.300	0.016	0.062	***
	社会信任→创业学习→绩效	0.038	0.010	3.720	0.018	0.058	***

注: ****、**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Bootstrap 区间估计为重复自抽样 1000 次 95%置信区间。

3. 创业环境的调节效应 (假说 H3a, H3b)。创业环境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如上表 2 方程 5 和方程 8 所示。方程 5 检验创业环境在创业学习与农民创业绩效之间的调节效应 (H3b), 从表中可知创业学习与创业环境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 即创业环境不能调节创业学习对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 假说 H3b 未得到验证。方程 8 检验创业环境在信任与创业学习之间的调节效应 (H3a), 表中结果显示信任与创业环境的交互项系数显著 ($\beta=0.169, p<0.05$), 即创业环境正向调节信任与创业学习之间关系, 假说 H3a 成立。

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假说 H3)。根据前文 (2) 式和 (3) 式可知, 系数 a_1b_2 、 a_3b_1 、 a_3b_2 中任意一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可证实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a_1 对应表 2 方程 8 中信任对创业学习的估计系数 ($a_1 \neq 0$), a_3 为方程 8 中信任与创业环境交互项的估计系数 ($a_3 \neq 0$), b_1 对应表 2 方程 5 中创业学习的估计系数 ($b_1 \neq 0$), b_2 为方程 5 中创业学习与创业环境的交互项系数 ($b_2 = 0$), 因此, 可以推断出 $a_3b_1 \neq 0$,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假说成立。由于仅依据两个系数各自的显著性来判断乘积的显著性缺乏对乘积标准误的考虑, 因此本文进一步参考 Edwards and Lambert (2007) 的做法, 用 Bootstrap 法计算中介效应量, 以此来判断中介作用是否随调节变量变化。常见做法是分别选取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作为调节变量取值的两端来检验条件取值下中介作用的差异是否显著。但刘东等 (2012) 指出与样本

标准差相比，变量的观测区间是更具有实际意义的取值范围。因此本文选取创业环境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作为条件取值，计算条件中介效应量，结果如表 4 所示，在创业环境最大值处的条件中介效应值为 0.296，创业环境最小值处的条件中介效应值为 0.130，两者差异为 0.166，差异的 BC-Bootstrap 方法 95% 水平下的置信区间为 [0.034, 0.298]，不包含 0，进一步证实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显著且效应规模具有实际意义，假说 H3 得到证实。

此外，为探究信任的不同维度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是否具有差异，本文依次对情感信任，制度信任和社会信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4，可以看出情感信任、制度信任及社会信任与农民创业绩效之间的有调节中介模型均成立。进一步验证，基于家庭与亲属关系的情感信任、基于政府政策的制度信任、以及针对普通公众的社会信任在农民创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该结果与 Stam et al. (2014) 的研究结论一致。

表 4 条件中介效应值及差异检验结果 (样本量=876)

条件中介效应	创业环境最大值	创业环境最小值	差值	差值的 BC-Bootstrap 区间估计	
				置信下限	置信上限
信任→创业学习→创业绩效	0.296	0.130	0.166	0.034	0.298
情感信任→创业学习→绩效	0.239	0.101	0.138	0.020	0.305
制度信任→创业学习→绩效	0.270	0.096	0.174	0.019	0.330
社会信任→创业学习→绩效	0.210	0.078	0.132	0.005	0.273

注: Bootstrap 区间估计为重复自抽样 1000 次 95% 置信区间。

(二) 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

1. 信任的内生性讨论。信任与农民创业绩效可能存在由于反向因果与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获得良好创业绩效的创业者可能具有更高信任水平，这种反向因果关系会高估信任的影响；另一方面，受研究设计限制，可能存在既影响农民信任又影响其创业绩效的变量被遗漏，如创业者人格特质等。为此，本文拟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借鉴何金财等 (2016) 的思路^①，最终选取了居住在同一县域同一年龄段其他创业者的信任平均值作为受访者信任的工具变量，理由是创业者的信任与所在地区和所处年龄段存在较大相关性，但该平均信任水平不会直接影响农民创业者的创业绩效。

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应同时满足外生性与相关性。外生性检验结果见表 5。如方程 9 所示，其他创业者信任平均值对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满足外生性条件。相关性检验结果如方程 10 所示，工具变量其他创业者平均信任值对信任的回归系数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同时 2SLS 第一阶段中的 F 统计量大于经验值 10，即可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因此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与内生变量高度相关，且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见表 5 方程 11，通过引入工具变量解决信任潜在的内生性后，农民创业者信任对其创业绩效的估计系数在 1% 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证实信任正向影响农民创业绩效。最后本

^① 何金财等 (2016) 用剔除自家以外的社区关系指数均值作为家庭关系的工具变量。

文采用更加稳健的 Durbin-Wu-Hausman 检验对信任的内生性进行检验, DWH 检验的 p 值为 0.375, 不能拒绝“变量为外生”的原假设。

同理, 当创业学习为因变量时, 信任也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导致估计有偏, 相关理由不再赘述。检验结果见表 5 方程 12 至方程 14。DWH 检验的 p 值为 0.197, 即 OLS 估计结果与 IV 估计结果并无显著差异, 无法拒绝“信任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该结果表明从统计上来讲, 在控制相关变量后, 信任无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表 5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农民创业绩效			创业学习		
	工具变量外生性 检验	2SLS 第一阶 段	2SLS 第二阶 段	工具变量外生性 检验	2SLS 第一阶 段	2SLS 第二阶 段
	方程 9	方程 10	方程 11	方程 12	方程 13	方程 14
信任	0.319*** (0.049)	—	0.511** -0.213	0.284*** (0.043)	—	0.580** (0.277)
信任平均水平	0.069 (0.078)	0.360*** (0.064)	—	0.101 (0.091)	0.339*** (0.071)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 值	13.21***	32.16***	11.18***	12.69***	23.98***	9.74***
样本量	876	876	876	876	876	876

注: ***、**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控制变量同表 2, 因篇幅限制故省略, 详细结果备索。

2. 稳健性检验。为检验以上数据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通过更换因变量农民创业绩效和自变量信任的测量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 采用因子分析及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计算信任与创业绩效的综合因子得分, 运用新生成的变量重复上述有调节的中介分析过程, 估计结果与已有分析无显著差异^①, 因此本研究的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三) 信任对农民创业绩效的异质性分析

1. 创业领域的异质性影响: 非农创业与涉农创业。由于农民创业者居住在农村地区, 具有土地和自然资源禀赋优势, 且普遍在农业生产领域经验丰富, 因而信任对农民创业绩效可能存在不同创业领域(涉农或非农)内的异质性影响。本文根据农民创业内容将样本拆分为非农创业组和涉农创业组, 进行分组回归, 实证结果见表 6 方程 15 和方程 16。从表中可以看出, 涉农创业组中信任对农民创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大于非农创业组。原因可能是在农村情境下, 涉农创业具有诸多比较优势, 信任发挥作用的空间较大。

表 6 信任对农民创业绩效的异质性影响

变量	涉农创业	非农创业	机会型创业	生存型创业	男	女
----	------	------	-------	-------	---	---

^① 限于篇幅, 结果未予展示, 详细结果备索。

信任有助于提升创业绩效吗

	方程 15	方程 16	方程 17	方程 18	方程 19	方程 20
信任	0.342*** (0.047)	0.270*** (0.089)	0.409*** (0.065)	0.265*** (0.054)	0.317*** (0.044)	0.338** (0.15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的 R ²	0.193	0.065	0.212	0.141	0.185	0.032
F 值	16.567***	1.983**	8.316***	6.761***	14.832***	1.207
样本量	719	157	382	494	793	83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同表 2，因篇幅限制故省略，详细结果备索。

2. 创业类型的异质性影响：机会型创业与生存型创业。全球创业观察（GEM）将创业动机划分为生存型创业与机会型创业。其中，生存型创业是指处于低收入状态且无其他就业选择的创业者，为生存被动从事创业；机会型创业则指个体主动发现商机并开展创业活动，以谋求潜在经济价值^①。Langevang et al. (2012) 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创业活动大部分属于生存型创业。在本研究样本数据中，生存型创业者数量为 494，占比 56.39%，略大于机会型创业者。相较于生存型创业，机会型创业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要求更高（蔡莉等，2008），可能造成信任对不同类型创业者产生异质影响。表 6 方程 17 和方程 18 结果显示，相比生存型创业的农民创业者而言，机会型创业者样本中信任对创业绩效的正影响更大。换言之，相较于为谋生而创业的农民而言，机会型农民创业者的信任可以促进其更好地获取创业信息与物质资源，提高创业成功率。

3. 性别的异质性影响：男性创业者与女性创业者。董静、赵策（2019）研究表明农民创业中存在性别的显著差异，受传统社会“男主外，女主内”思想的影响，创业作为一种高风险强社交型活动多由男性主导，这一固化观念可能导致信任对男性创业者和女性创业者产生异质影响。从表 6 方程 19 和方程 20 可以看出，在男性创业者子样本中，信任对农民创业绩效发挥积极促进作用，相比之下，信任对女性创业者绩效的正向影响虽通过 T 检验，但未通过整体参数 F 检验。本文认为由于社会角色分工以及人力资本双重约束，农村女性创业者往往具有较少人缘关系与社会网络，显著抑制了信任对其创业绩效的促进作用。

4. 信任差序格局的异质性影响。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论最早由费孝通提出，其中“差序”的含义除“关系的差序”外，还包括“情感的差序”（李伟民、梁玉成，2002），即根据亲疏远近决定相互之间情感的认同程度，从而影响情感信任的大小。由此可知，情感信任的“差序格局”可能会对农民创业绩效产生影响。从表 7 可以看出，对周围各群体的情感信任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创业绩效，其中，对同一大姓成员和朋友的情感信任产生的创业绩效提升作用最强。如前文论述，家人亲戚提供的信息与资源通常在农民创业初期起决定作用，但随着创业事业不断扩大，离创业者距离稍远的非冗余关系所提供的资源则更为重要，这也从侧面证实 Granovetter 的弱连接理论。相类似，Li (2004)

^① 根据该定义，本文将因“谋生或解决温饱问题”而创业归为生存型创业，将因“追求富裕生活或实现自我价值”而创业归为机会型创业。

指出在中国乡村地区存在制度信任（政府信任）的差序格局，表现出“央强地弱”的趋势。这种差序格局可能会对农民创业绩效产生影响，如表 7 所示，制度信任的四个方面均正向影响农民创业绩效，但同时也表现出差序格局的异质影响，中央政府和国家创业政策的信任比地方政府和地方创业政策的信任具有更强的创业绩效提升作用。

表 7 差序格局下情感信任与制度信任对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

因变量	情感信任差序格局的异质影响					制度信任差序格局的异质影响			
	亲戚	同一大姓	朋友	邻居	同村村民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国家创业政策	地方创业政策
农民创业绩效	0.108*** (0.040)	0.143*** (0.040)	0.136*** (0.040)	0.088** (0.040)	0.105*** (0.036)	0.139*** (0.032)	0.132*** (0.035)	0.155*** (0.036)	0.103*** (0.03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的 R ²	0.122	0.130	0.126	0.120	0.124	0.138	0.129	0.136	0.129
样本量	876	876	876	876	876	876	876	876	876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同表 2，因篇幅限制故省略，详细结果备索。

五、主要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东、中、西部四省 876 个农民创业者的调查数据，系统探究了信任与农民创业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1）信任对农民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对于农民创业者而言，信任水平越高，其创业绩效越好。（2）创业学习在信任与创业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简言之，信任通过提高农民创业者对信息和知识的接纳度，促进农民创业者开展创业学习，增强创业技能，进而提升创业绩效。（3）创业环境调节了创业学习在信任和创业绩效间的中介作用，但创业环境未能调节创业学习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可能的解释为，创业学习影响创业绩效的内在逻辑是农民创业者通过学习丰富创业知识、提升创业能力，但知识和能力的运用更多受制于创业者自身特质和主观能动性，从而使得创业环境的调节机制未能发挥显著作用。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首先，从信任的角度出发，政府应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提高社会总体信任水平；对缺乏信任的事件增加媒体曝光度和舆论关注度，引导并提升农村地区信任水平。其次，从创业学习的角度来看，基层政府相关部门应丰富农民创业培训内容，培养农民创业者的学习意识和学习能力；成立农民创业协会，鼓励创业者相互学习，分享经验，共同提高创业能力。最后，各级政府应优化创业支持政策，营造良好创业环境，可通过完善要素市场、金融支持政策、网络信息平台、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为农民创业者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 蔡莉、崔启国、史琳，2007：《创业环境研究框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1期。
2. 曾燕萍，2019：《信任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个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第2期。

- 3.单标安、蔡莉、鲁喜凤、刘钊, 2014:《创业学习的内涵、维度及其测量》,《科学学研究》第12期。
- 4.单标安、陈海涛、鲁喜凤、陈彪, 2015:《创业知识的理论来源、内涵界定及其获取模型构建》,《外国经济与管理》第37卷第9期。
- 5.董静、赵策, 2019:《家庭支持对农民创业动机的影响研究——兼论人缘关系的替代作用》,《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 6.高学德、翟学伟, 2013:《政府信任的城乡比较》,《社会学研究》第2期。
- 7.郭铖、何安华, 2017:《社会资本、创业环境与农民涉农创业绩效》,《上海财经大学学报》第2期。
- 8.郭慧云、丛杭青、朱葆伟, 2012:《信任论纲》,《哲学研究》第6期。
- 9.何金财、孙永苑、杜在超、张林, 2016:《关系、正规与非正规信贷》,《经济学(季刊)》第15卷第1期。
- 10.李伟民、梁玉成, 2002:《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 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社会学研究》第3期。
- 11.李新春、叶文平、唐嘉宏、区玉辉, 2015:《创始爱心资金获取: 情感信任还是能力信任》,《管理科学》第2期。
- 12.刘畅、齐斯源、王博, 2015:《创业环境对农村微型企业创业绩效引致路径的实证分析——基于东北地区实地调研数据》,《农业经济问题》第36卷第5期。
- 13.刘东、张震、汪默, 2012:《被调节的中介和被中介的调节: 理论构建与模型检验》,载陈晓萍、徐淑英、樊景立主编《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第2版)》,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4.罗家德、帅满、杨鲲鹏, 2017:《“央强地弱”政府信任格局的社会学分析——基于汶川震后三期追踪数据》,《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15.申丹琳, 2019:《社会信任与企业风险承担》,《经济管理》第41卷第8期。
- 16.王洁琼、孙泽厚, 2018:《新型农业创业人才三维资本、创业环境与创业企业绩效》,《中国农村经济》第2期。
- 17.王勇, 2017:《创业环境、风险态度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倾向》,《经济体制改革》第1期。
- 18.杨明、孟天广、方然, 2011:《变迁社会中的社会信任: 存量与变化——1990—2010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8卷第6期。
- 19.余绍忠, 2013:《创业绩效研究述评》,《外国经济与管理》第2期。
- 20.张敬伟、裴雪婷, 2018:《中国农民创业者的创业学习行为探析》,《科学学研究》第36卷第11期。
- 21.张立芸、谭康荣, 2005:《制度信任的趋势与结构:「多重等级评量」的分析策略》,《台湾社会学刊》第35期。
- 22.张玉利、冯潇, 2019:《三农创业实践驱动的学术问题与研究建议》,《南方经济》第7期。
- 23.赵红丹、夏青, 2019:《人际不信任、消极情感与知识隐藏行为研究》,《科研管理》第40卷第8期。
- 24.郑风田, 2018:《乡村振兴战略给乡村企业带来哪些新机遇》,《人民论坛》第17期。
- 25.周广肃、谢绚丽、李力行, 2015:《信任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及机制探讨》,《管理世界》第12期。
- 26.Arrow, K. J., 1972, “Gifts and Exchanges”,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343-362.
- 27.Bennett, N. and J. Lemoine, 2014, “What VUCA Really Means for You”,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92(1):2.
- 28.Bergh, P., S. Thorgren and J. Wincent, 2011, “Entrepreneurs Learning Together: The Importance of Building Trust for Learning and Exploiting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7(1):17-37.
- 29.Bhagavatula, S., T. Elfring, A. van Tilburg and G. G. van de Bunt, 2010, “How Social and Human Capital Influence

-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in India's Handloom Industry”,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5(3):245-260.
30. Brouwer, M., 2000, “Entrepreneurship and Uncertainty: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mong the Many”,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15(2):149-160.
31. Dai, W., F. Arndt and M. Liao, 2020, “Hear It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Recognizing Policy-induced Opportunities”,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32(5):408-428.
32. Dou, J., B. Ye, J. Ye and Z. Pan, 2019, “Trustworthiness of Local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nd Self-employment in Transition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57.
33. Edwards, J. R. and L. S. Lambert, 2007, “Methods for Integrating Moderation and Mediation: A General Analytical Framework Using Moderated Path Analysis”, *Psychological Methods*, 12(1):1-22.
34. Fornell, C. and D. F. Larcker, 1981,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39-50.
35. Gartner, W. B., 1985,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Describing the Phenomenon of New Venture Cre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0(4):696-706.
36. Geneste, L. and P. Galvin, 2013, “Trust and Knowledge Acquisition by Small and Medium-sized Firms in Weak Client-Firm Exchange Relationships”,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Researching Entrepreneurship*, 33(3):277-298.
37. Granovetter, M. 2017. *Society and Economy: Framework and Principles*.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8. Hair, J. F., W. C. Black, B. J. Babin and R. E. Anderson. 2014.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London: Pearson.
39. Hayes, A. F. 2018.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40. Langevang, T., R. Namatovu and S. Dawa, 2012, “Beyond Necessity and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 Motivations and Aspirations of Young Entrepreneurs in Ugand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Review*, 34(4):439-460.
41. Li, L., 2004, “Political Trust in Rural China”, *Modern China*, 30(2):228-258.
42. Newton, K. and S. Zmerli, 2011, “Three Forms of Trust and their Association”,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2):169-200.
43. Politis, D., 2005, “The Process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 Conceptual Framework”,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9(4):399-424.
44. Poppo, L., K. Z. Zhou and J. J. Li, 2016, “When Can You Trust ‘Trust’? Calculative Trust, Relational Trust, and Supplier Performanc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7(4):724-741.
45. Putnam, R. D., R. Leonardi and R. Y. Nanetti. 1994.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6. Rooks, G., K. Klyver and A. Sserwanga, 2016, “The Context of Social Capital: A Comparison of Rural and Urban Entrepreneurs in Uganda”,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40(1):111-130.
47. Shane, S. and S. Venkataraman, 2000, “The Promise of Entrepreneurship as a Field of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5(1):217-226.

48. Stam, W., S. Arzlanian and T. Elfring, 2014, "Social Capital of Entrepreneurs and Small Firm Performance: A Meta-Analysis of Contextual and Methodological Moderator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9(1):152-173.

49. Tseng, C., 2013, "Connecting Self-Directed Learning with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to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 Research*, 19(4):425-446.

50. Welch, M. R., R. E. N. Rivera, B. P. Conway, J. Yonkoski, P. M. Lupton and R. Giancola, 2005,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Trust", *Sociological Inquiry*, 75(4):453-473.

51. Welter, F., 2012, "All You Need is Trust?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Trust and Entrepreneurship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Researching Entrepreneurship*, 30(3):193-212.

(作者单位: 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²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部发展研究院)

(责任编辑: 光明)

Does Trust Enhance Entrepreneurs'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Zhao Jiajia Wei Juan Liu Jundi Liu Tianjun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ust and venture performance of small business owners in rural areas. Specifically, the study identifies the direct impact of trust on business performance. It further examines whether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ust and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and whether this mediation effect is moderated by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The empirical result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876 rural entrepreneurs show that trust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business performance of rural entrepreneurs, and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plays a significant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trust and venture performance. Moreover, trust can indirectly affect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of farmers by promoting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nd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positively regulates the impact of trust on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but the regulatory effect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nd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fails to pass the significance test.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rural entrepreneurs' level of trust and how trust affects their business performance. Accordingly, policymakers can enhance the venture performance of rural entrepreneurs by stimulating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skills training, improving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bilities and promoting good business environment.

Key Words: Trust; Rural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